

达蒙·加尔格特《承诺》:

## 没有爱就没有未来

□高 银

南非作家达蒙·加尔格特(Damon Galgut)凭借其第九部小说《承诺》(The Promise)入围2021年布克奖并最终拔得头筹。《承诺》承袭了南非文学的优良传统,为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英语文学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承诺》由四章组成,各章分别围绕白人农场主斯瓦特家族的一场家族葬礼展开,女主人蕾切尔病逝前让丈夫马尼将黑人女仆萨洛米所住房屋赠予这位忠仆的“承诺”则是串联起四章的核心情动事件。本文从情动研究(Affect Studies)的视角出发,剖析斯瓦特家族两代人在承诺、背诺与践诺行为背后的情感归因,即羞耻、愤怒与同情,探索南非白人为性别政治、种族政治与阶级政治调节所操控的种族情感与种族态度,展示出基于爱的非洲乌班图精神是新南非种族和解与民族未来的情感基石。

## 羞耻:作为救赎方式的承诺

小说核心事件“承诺”不仅关乎个人道德,还涉及主体在情感层面对性别、阶级,尤其是种族问题的态度与行动倾向。因此,围绕“承诺”、“背诺”和“践诺”的情节设计无异于对当代南非社会种族政治现实的诊断。在情动视角下,人的本质是动态的情感活动,人的所作所为是对所处环境的情动调节。在此基础上,具有认知维度的情感状态也许可以揭示主体之在。那么,斯瓦特家族女主人蕾切尔是何种情动?她又为何会在此种情形下做出承诺?答案也许暗藏于阿莫尔无意间目睹的承诺原初场景之中:病人膏肓的母亲让父亲许诺,将萨洛米所住三间房屋及宅基地赠予这位黑人女仆。

承诺的源头既是小说的道德罗盘,又是解读承诺背后情感动机的密钥。一方面,承诺是小说一再回指的“时间源”与道德基准,阿莫尔正是在脑中挥之不去的承诺原初场景指引下,三十年如一日坚定地走向道德的正北方才最终促使承诺兑现;另一方面,在蕾切尔做出承诺的场景中,从她的身体状态、行为举止到坚定态度与情感强度,无不暗示着承诺背后强大的情感动机。蕾切尔对丈夫的叮嘱有些近乎命令的语气,“答应我会你做”。这难免让读者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女主人女仆间的“我-她”关系亲胜夫妻间的“我-你”关系。这是因为在性别政治的操控下,“妻子与仆人一样,只是叫法不同”。蕾切尔与萨洛米均为南非社会性别歧视的牺牲品,女性本体以及与之密不可分的母性使二者处于不同程度的受剥削、遭羞辱的他者地位。蕾切尔与萨洛米之间基于自身女

性羞耻的纠结与牵连状态有助于读者理解蕾切尔的承诺及此后围绕承诺出现的纷争。

蕾切尔与萨洛米虽然身份地位悬殊,但她身为女性的生育功能与母性形象均受到男权社会不同程度的利用与剥削。蕾切尔自20岁未婚先孕嫁进斯瓦特家至40岁病逝,一直被困在妻子与母亲角色的牢笼中而未能离开过农场主房屋这座房子。同样被困于此的黑人女仆萨洛米遭到的剥削更甚,因为她所从事的是对雇主具有高度依赖性的“低贱”的家政工作。在蕾切尔病重时,她身体失凋引出的污秽腌臢连她的家人都觉得肮脏而不愿意侍奉在侧,众人纷纷把脏活累活都推给萨洛米,因为“她拿钱就是干这个的”。病体的属性是蕾切尔自我的一部分,无法去排斥;萨洛米照料病人的工作在他人看来肮脏不堪,这也是黑人女仆身份与自我的一部分。

鉴于此,承诺是蕾切尔洗雪自身羞耻、实现自我救赎的方式,它同时还象征着白人斯瓦特家族乃至整个南非在20世纪80年代超越国耻、重塑理想的可能。蕾切尔做出承诺的1986年正是全球反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声浪高涨的一年,甚至连一向对南非问题态度暧昧不明的美英两国也明确加入国际反种族隔离阵营。虽然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在蕾切尔去世后18年才被废除,但她的承诺如石子般在死水一潭的种族僵局中激起层层涟漪,引发斯瓦特家族两代人对承诺的连锁反应并最终由新南非白人女性阿莫尔带来某种程度的种族和解。

## 愤怒:背诺的情感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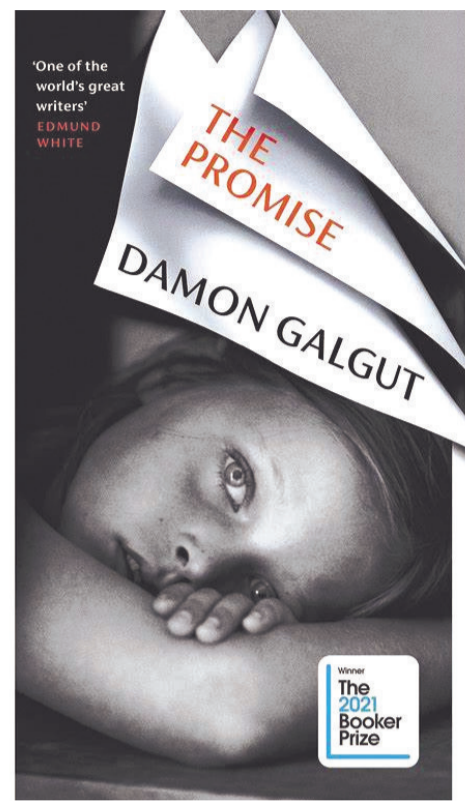
愤怒与羞耻都是规范性、惩戒性、社会性的情感。小说中马尼的愤怒就是主体狂暴地表达自我权力意志,用特殊利益碾压他者利益的工具。任何忤逆与反抗都会招致马尼惩戒性乃至报复性的愤怒,他对儿子反叛的余恨历时九年也未消减,以至在遗嘱中规定若儿子不认错道歉将被剥夺遗产继承权。他完全无视亡妻遗愿,矢口否认亲自许下的承诺,却常将上帝、罪与罚等挂在嘴边。如此这般,只会对人际关系造成不可挽回的破坏并在此过程中滋生更多愤怒与暴力,最终使家庭陷入消极的恶性循环。

在探究马尼违背诺言的根本原因时,读者应注意到承诺背后折射出的黑人土地的要求不仅触及马尼身为白人农场主的经济利益,更让他觉得这是对其统治阶级自我身份认同的挑战。妻子去世后,马尼虽然记得承诺之事却斩钉截铁地予

以否认,还警告儿子“选好边站”。他用愤怒这种晒晒的情感表达将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转移到自己身上,让子女与亡妻的意志屈从于自己的意志从而模糊问题焦点。“选好边站”的警告更是意味深长,毫无疑问,此处的“边”指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下黑白对立的种族分界线。土地之于马尼不仅是自然资源与生产工具,更是其身为白人少数派统治者与白人农场主的自我身份认同。当土地被冠以“我们的”这个形容词时,它就成为主体自我的重要部分,成为主体巩固内在身份的外部证据。因此,当他者提出土地要求时,马尼感到这无异于对他本人的挑战,愤怒自然随之而来。

愤怒的恶性循环或曰代际传递在斯瓦特家族也完全应验:当马尼将愤怒用作教育子女尤其是规训儿子的工具时,安东已将这种白人统治阶级的家长做派内化为自己的情感依托。他不仅习得了父亲基于愤怒的根深蒂固的种族态度,还继承父亲的衣钵,拒绝履行承诺。在小说第二章马尼去世的1995年,南非民主政体虽已建立,但南非白人的种族态度依然僵化。在与阿莫尔讨论承诺问题时,安东推诿搪塞,拒绝兑现承诺,并说“即便我们做了所有那些事,也不能保证情况会有所改变”。他重提父亲当年资助黑人女仆之子上学但后者中途辍学一事以说明白人对黑人的善意纯属浪费时间。然而,黑人要靠白人资助方能上学这件事本身就说明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下黑人的绝对劣势与公民权丧失。然而,安东完全不考虑南非种族主义教育体系与就业制度对非洲人的剥夺而一味地站在统治阶级的道德制高点讽刺挖苦弱势群体。

马尼与安东父子的背诺行为及其背后的情感归因表明,愤怒是当时的白人种族态度建构之基石。自1948年南非国民党执政起至种族隔离制度瓦解前的四十余年间,南非基督教国家教育与白人家庭教育一道对白人青少年进行反复的意识形态灌输。他们一方面以愤怒作为重要的社会化工具让白人青少年学会绝对服从并接受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另一方面以愤怒作为白人种族态度的基础。在愤怒的代际传播与恶性循环中,主体的愤怒强度、持续时间与暴力程度极易不断升级并最终反噬愤怒主体。安东的愤怒不断累积难以排遣,在与妻子的情人发生肢体冲突后更觉了无生趣,最终欲弹自尽,用小妹阿莫尔的话说,“他所有的力量与狂怒都被释放出来,猛地倒进枪管里,瞄准他生命的中心”。



《承诺》英文版

## 同情:一种和解的希望

安东与阿莫尔两兄妹正是小说中的情动两极:如果安东代表旧南非既得利益者以消极情动愤怒维持白人少数派统治的社会痼疾,那么阿莫尔则象征新南非女性以积极情动同情实现种族和解的希望。阿莫尔(Amor)之名意为“爱”。同情(compassion)源于拉丁文,意为“一起受苦”,其中passion一词既有激情之意又含宗教意味。阿莫尔的圣洁之爱与人性光辉使她的同情积极正向,这种积极情动贯穿于其见证承诺、传播承诺与践行承诺的一系列行动之中。

阿莫尔的意义与价值在于完全承认他者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它让我们个人生活的中心发生转移”。在这位女主人身上,读者可以感受到同情是一种具有明确客体与鲜明意向性的情感,主体关注的焦点是他者的痛苦、苦难与损害。想象他者处境并视之为同类,主动关心他者福祉且具



达蒙·加尔格特

有一定强度的情感反应。这两个特征结合在一起使同情具有超越怜悯、善意等利他主义情感的道德规范。高强度的情感反应迫使伦理主体在通过想象重构他者苦难、深入了解其痛苦后,产生帮助他者解脱的强烈愿望并最终努力付诸实践。

他的痛苦通过视觉、听觉与触觉被传递与感知,这意味着同情主体需要采用共视视角,并聆听他者痛苦,才能最大限度激发内在的大爱。将他者视为同类,体现出主客体间共有的博爱精神。阿莫尔对黑人的处境感同身受,因为她也常遭众人忽视。其次,对他者的专注聆听是阿莫尔富有同情心的另一表征,深度倾听既显示出听者的谦逊包容,又是对他者的理解与敞开。家人注意到阿莫尔善于聆听的特质,并在向她倾诉的过程中释放紧张压力、宣泄负面情绪,给弱者带去精神慰藉。

同情这种积极情动在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具有重要的政治价值与社会价值,因为它与乐于助人、宽容和理解等美德共同构成南非传统思想乌班图(Ubuntu)的精神内核。乌班图源于恩古尼语格言“人之为人,有赖他人”(A person depends on other people to be a person),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共情与互相依赖的哲学。

作为一部情感充沛、意味深长的家世小说与现当代南非农场真言,《承诺》既可以激发读者对南非及其人民的真切情感,又可使读者透过情动研究视角思考个体在人生际遇中影响与被影响的能力。白人斯瓦特家族对黑人女仆的承诺、背诺与践诺行为背后暗藏着南非性别、种族与阶级操纵的情感密码,而解碼羞耻、愤怒与同情既有助于读者走进当代南非白人复杂的种族情感腹地,又能为理想道德的重塑提供行动指南。

(作者系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青年教师)

## 安妮·埃尔诺:回到伊沃托,回到记忆之城

□李 琦



伊沃托街景

2022年,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以表彰她“勇敢又确切地书写从个人记忆中挖掘出的根源,疏离以及集体约束”。埃尔诺生于1940年,5岁时全家搬到伊沃托(Yvetot),18岁之前,她几乎没有离开过这座小镇。即使高中毕业考入鲁昂大学修读文学专业,由于鲁昂和伊沃托相隔不远,她常常利用周末往返两地。直到24岁结婚成家,她才算是真正离开了伊沃托。此后的年月里,她因探亲回过几次故乡,但从未以作家的身份重返伊沃托。2012年,应伊沃托市政府邀请,埃尔诺在当地图书馆和读者见面,举办了一个面向近500人的讲座。次年,演讲实录整理成书出版,名为《回到伊沃托》(Retour à Yvetot)。2022年又推出全新修订版,埃尔诺特别为新版撰写了序言,并在书中添加了很多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包括埃尔诺的家庭照片、日记片段、学校成绩单、六年级的写作练习、写给朋友的书信,等等。

安妮·埃尔诺在伊沃托生活成长,伊沃托对她的意义不言而喻,她将伊沃托视作她的“起源之城”,是她写作的“不朽之地”。埃尔诺的父母在伊沃托经营咖啡杂货店,全家的卧室就在店铺楼上,埃尔诺的生活几乎没有私密性。杂货店位于伊沃托市中心和农村的中间地带,大部分顾客来自于平民阶层,其中有人因为一时拿不出钱而赊账。杂货店不同于后来兴起的大超市,它的生存维系依赖于邻里关系,这里每天人来人往,彼此相熟,埃尔诺可以叫出每个顾客的名字,知道每个人家里的故事。这些当地顾客都曾出现在她的处女作《空衣橱》中,只不过被“改头换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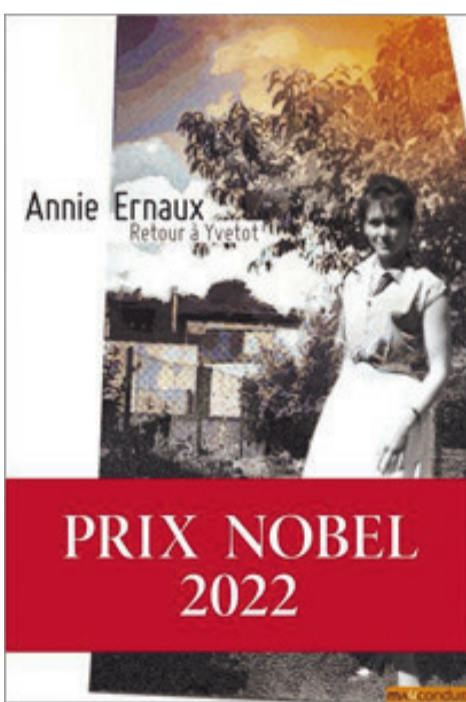
## “我恨那个女生,但我更恨我自己”

伊沃托是埃尔诺的“记忆之城”,是她的永恒

牵挂。在埃尔诺看来,有关伊沃托的记忆和她的写作以一种“不可分离”甚至是“无法抹去”的形式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一些作品中,埃尔诺直接使用“伊沃托”这个真实的地名,比如《一个女人》《悠悠岁月》《另一个女儿》;在另一些作品中,伊沃托被缩写成“Y城”,比如《位置》《羞耻》。对年少的埃尔诺来说,伊沃托代表了现实世界的边界,她在《羞耻》里这样写道:“在1952年时,我对Y市以外的世界一无所知。对于我,不存在在其他的地方,不存在其他的世界。”

伊沃托的区隔现象非常明显,这种区隔更多的是一种社会意义上的区隔,也就是资产阶级和平民阶层的区别。埃尔诺出身平民阶层,这个阶层的人讲话夹杂着方言土语,开着粗俗的玩笑,他们从未去过博物馆,更不懂欣赏艺术。如果要去市中心,他们会说“我要进城了”,“进城”则意味着进入一个不属于他们的地方,在那里,他们的言行举止会被另一个阶层的人评头论足,稍不留神,“他人目光之地”就会变成“羞耻之地”。尽管埃尔诺的家庭并不富裕,但是父母格外重视她的教育,把她送到私立教会学校读书。在学校里,埃尔诺真切地感受到了阶级的差距。“羞耻感”在她身上蔓延。她曾因父亲的法语讲得不标准而向他抱怨:“你们一直都说不好话,你们怎么能要求我不被老师揪出来批评啊?”在埃尔诺的青少年时期,因为语言不规范引发的家庭争吵甚至比因为经济条件不宽裕引发的争吵还要多。

在伊沃托的演讲中,埃尔诺还说出一个从未在作品中提过的故事:有次上课前,班上一个家庭条件好的女生突然大喊:“谁身上有一股消毒水的味道?我简直受不了这个味道!”埃尔诺知道这个味道来自于她身上,因为她家没有自来水,全家人



《回到伊沃托》修订版

都是在盆里洗手。对于平民阶层来说,作为洗衣服的必需品,消毒水是干净的象征,然而,对于资产阶级而言,消毒水的味道具有了某种社会阶层属性,是“女佣的味道”,是“下等人的味道”。埃尔诺为此感到羞耻,“我恨那个女生,但我更恨我自己”。埃尔诺说她不是恨自己羞于承认真相,而是恨自己把手浸在盆里,恨自己不懂另一个阶层的好恶,才让对方有了羞辱自己的机会。

对埃尔诺而言,一切羞耻的根基都要回到1952年6月15日:“那是六月的一个星期天,中午刚过,我的父亲要杀我的母亲。”作品《羞耻》就是这刚开篇的,这起事件作为埃尔诺“童年时代记忆最深刻最清楚的日子”,如同梦魇一般,萦绕在作家心头,久久挥之不去。直到很多年后,埃尔诺才鼓起勇气把它写下来。埃尔诺在书中明确表示,她不是在写故事,也不是在写回忆录,相反,她想追溯根源,做一次自己的人类学家。埃尔诺采用社会学的手法,从事件发生的咖啡杂货铺出发,将写作视角延伸到小镇伊沃托,她不仅详细刻画了伊沃托的地形地貌,还以“清单”的形式列举了平民阶层的日常图景,把当地人的生活情况、规则习俗、使用的语言一一展示给读者。

## 是记忆催生写作,而不是现实催生写作

离开伊沃托,逃离平民阶层,有两个渠道:一个是学校里的知识,另一个是阅读。正是这两者将埃尔诺从她的原生阶层连根拔起。在《位置》里,埃尔诺写道:“当我开始结识Y市的小资产阶级,对方问起我的喜好,是爵士乐还是古典音乐,达迪还是勒内·克莱尔,我明白我已经属于另一个阶层了。”埃尔诺学习用功,成绩优异,她考入鲁昂大学,毕业后通过了中学教师资格考试,获得了高中的教职工作,成功实现了“阶级跃迁”。离开伊沃托后,埃尔诺先后在波尔多和安纳西生活,自1977年起,她搬到距离巴黎不远的新城塞尔吉(Cergy)一直生活至今。年复一年,她见证了这座新城的修建工程,也让她想起了1950年代在法国经济“黄金三十年”背景下施工建设的伊沃托。塞尔吉如同伊沃托的“镜像”,把埃尔诺的思绪拉到遥远的往昔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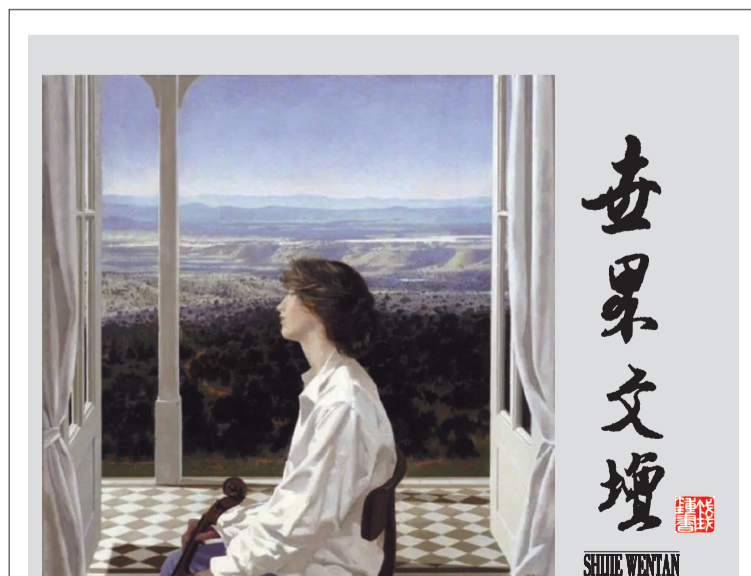
对安妮·埃尔诺而言,伊沃托具有鲜明的矛盾性:一方面伊沃托是她的幸福之地,她在那里学习知识,开启阅读,这两者塑造了她的品格;另一方面,伊沃托也是她的羞耻之地,让她感受到阶级的差异,激发了她想要写作的欲望。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中,埃尔诺提到自己曾“傲慢而天真地认为,就算我是失地农民、工人和小商贩的后代,就算祖先因行为举止、口音、缺乏教育而饱受蔑视,写作并成为一名作家,足以弥补因家庭出身而遭到的社会不公”。伊沃托在她的写作中占据重要的位置,成为她挥之不去的“记忆空间”。这座“记忆之城”保存堆叠了她的种种过往经历,共同构成了埃尔诺的记忆图像,宛若一个“重写本”,擦除了又再次浮现。埃尔诺表示,她所书写的伊沃托都是基于她记忆之上的伊沃托。如果出现了写作与实际不符的情况,那也是记忆的偏差,她从未想过篡改事实。《空衣橱》写完两年后,她回到伊沃

托,彼时她已经八年没有重回故乡了。然而当她走在伊沃托的街道上时,她发现眼前真实的伊沃托和她写作时记忆中的伊沃托并不一样。所以,埃尔诺才会说,是感觉记忆,特别是儿童时期的感觉记忆催生写作,而不是现实催生写作。

安妮·埃尔诺在《位置》的扉页引用了一句热奈特的话:“当人们背叛之后,写作便成为唯一的求助方式。”作为一个“社会内部移民”,埃尔诺书写平民阶层,致力于“深入挖掘那些记忆中被压抑的、无法言说的东西,去揭示我的阶层是如何生活的。写作是为了理解使我与自己的根源日益疏离的内外国”。埃尔诺年轻时曾立下誓言:“我要写作,为我的阶级复仇。”今天埃尔诺自称难以说清是否已经实现当年许下的承诺。然而有一点毋庸置疑,“正是从我的阶级,从我的先辈,从那些因辛勤劳作而过早离世的男男女女那里,我拥有了足够的力量和愤怒,才有了要在文学中为他们留出一席之地之愿望和雄心。”

写作成为埃尔诺的一种痴迷,她以个人记忆为切入点,书写集体记忆与普遍现实。埃尔诺在访谈集《真正的地点》里写道:“我相信那些曾经穿过我的东西也一定穿过了其他人。”她希望书中的“我”以某种方式变得透明,这样读者的“我”便可以完全融入书中的“我”,使其作品更加具有普遍性。埃尔诺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时称,这项最高的文学荣誉并非是她个人的胜利,而是一场集体的胜利。对埃尔诺而言,回到伊沃托,是回到根基之所在,是对“我是谁”“我来自哪里”的深刻叩问。埃尔诺笔下的“伊沃托”宛若一块试验田,它也可以是巴黎,是兰斯,是都柏林,是你我每个人的故里……

(作者系中国驻法国使馆工作人员)



南非艺术家 Neil Rodger 绘画作品

世界文坛  
SHUI GUO WEN TAN